

命運選擇



如果按命運最初安排的道路走下去，王光美日後可能成為像居里夫人那樣的科學家，但在人生十字路口，她選擇了另一條道路。這一條道路日後給她帶來了無上榮耀，也給她帶來了莫大的磨難。



接近地下黨

一九四五年六月，王光美在嫂子王新和妹妹王光的介紹下，認識了北平地下黨組織領導人崔月犁，從此與中共地下黨建立了聯繫。當時，崔月犁在中共北平市委擔任學生工作委員會委員兼秘書，正在物色挑選學生、知識份子，為以後更為複雜的對敵鬥爭和革命建設積蓄人才。

兄妹的影響，時局的動盪，以及自己對共產黨的同情，內因外因結合，促使王光美走上了紅色之旅。不過，在做出這一人生重大選擇過程中，她也有過激烈甚至痛苦的內心矛盾和思想鬥爭。

盛夏的北平酷熱難當，而位於天安門右側的太廟卻綠蔭如蓋，涼爽宜人，和王光美建立聯繫的那段時間，崔月犁多次約請她到這裡談話，一邊散步，一邊給她介紹共產主義理論和共產黨的發展歷史。雖然自己的兄妹已經是中共黨員，但王光美還是第一次接受黨組織的入門教育，通過崔月犁的介紹和講解，她對共產黨有了更深入的瞭解。

除了談話，崔月犁還給她推薦了幾本共產黨的書籍。其中一本就是劉少奇寫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回到家裡，她把這本書讀了好幾遍，並記住了作者的名字，她非常欽佩這位作者的理論水準，但當時還不知道劉少奇在中共黨內的職務地位，更不可能想到日後這個人改變了她一生的命運。

剛開始，崔月犁並沒有交給王光美具體任務，只鼓勵她首先在思想上，然後在行動上向黨組織靠攏。當時王光美也產生了加入共產黨的想法，但又認為自己還不夠條件。因為她還做不到《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所要求的「絕對服從」黨組織，所以入黨的事就拖了下來。當時她還是輔仁大學的學生和老師，正打算碩士研究生畢業後，去美國深造，利用課餘和業餘時間幫地下

黨做點事，對她來說，可能還有點「玩票」的意思。

但事情的發展很快超出了她原來的預想。一九四六年二月一天，崔月犁又一次約見王光美，地點仍是太廟。這次約見，他和王光美談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冬天的太廟，天寒地凍，遊人稀少，他們可以毫無顧忌地交談。「光美，黨組織交給你一個任務，不知你願意不願意接受？」崔月犁試探著對王光美說。「什麼任務？」王光美連忙問道。

「我們黨和國民黨，還有美國剛剛在北平成立一個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團想雇請幾個英文翻譯，有薪水，當然不很多。黨組織經過研究，認為你比較合適，你英語不錯，政治上也可靠……」崔月犁說完這番話，用期待的目光看著王光美。

說話一向爽快的王光美，沒有馬上回答，她臉上露出一絲為難的神色。顯然，崔月犁交給她的這個任務出乎她的意料。「讓我想想吧！」片刻沉默後，王光美才開口說話。

「這個工作很重要呀……」崔月犁有點失望，繼續說道。王光美聽他說完，有點動心，但還是沒有答應：「你還是讓我再想想吧。」崔月犁只好同意她好好考慮。

和王光美談話後的第三天，崔月犁又上門來找王光美，問她想好沒有。她答覆說：「真的還沒想好。」當時，她確實很猶豫，甚至想推掉這個任務。「我學的不是英語專業，也不懂軍事，怎麼能到軍調部當翻譯？而且我正在考慮去美國留學，到軍調部後，還走得成嗎？」她晚年回憶當年的複雜心理時說。

王光美遲遲不答應，崔月犁心急如焚。軍調部的工作已經啟

動，需要的翻譯還沒到位，中共代表團負責人葉劍英幾次催促，崔月犁無法交差。情急之中，他決定使出「殺手鐮」。他馬上寫了一張紙條，交給了王光和美，責成她轉交王光美。

紙條的大意是，如果王光美不接受這次任務，地下黨就再也不和她聯繫了，看了這張相當於最後通牒的紙條，王光美差一點哭了。儘管捨不得放棄自己的專業和到美國留學的機會，但她更不願意被地下黨「拋棄」，因為多年來她對共產黨人一直懷有非同尋常的感情，度過難眠的一夜之後，她終於做出了自己的選擇。第二天，她揣著地下黨的介紹信，騎上自行車，在霏霏細雪裡走進了中共代表團駐地翠明莊。





新奇的生活

翠明莊位於北平南河沿，是一座十分氣派的三層中西合璧的樓房，上世紀三〇年代由侵華日軍所建。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把它作為勵志社的招待所，北平軍調部成立後，這裡便騰出來做了中共代表團的駐地。

報到那天，第一次到這裡的王光美找不到放自行車的地方，竟在衛兵注視下把車推進了大樓。接待她的是中共代表團秘書長李克農。看了介紹，他非常客氣地說：「你就是王光美同志，歡迎歡迎！」顯然，北平地下黨組織早已向他介紹過王光美。他問了問王光美家庭和學校的一些情況，然後說：「你把地址留下來，先回家休息，明天我們派車去接你。」

臨走時，王光美聽到樓裡有人在唱一支曲調很美的歌，她從沒聽過，便好奇地問：「這是什麼歌？」李克農笑著說：「這是陝北民歌，叫《走西口》。以後你如果到延安去，還可以聽到那裡的民歌信天遊，也很好聽。」

第二天一早，中共代表團的一輛小車徑直開到王光美家門口。

王光美便坐著這輛小車來到翠明莊上班。正如崔月犁介紹的，她被安排在翻譯處當翻譯。從這一天起，她就成了中共代表團正式雇用的工作人員。

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簡稱軍調部）是為落實國共雙方簽訂的《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協議》，於一九四六年一月成立的，負責調解、處理國共雙方的軍事衝突。中共方面的代表是葉劍英，國民黨代表是鄭介民，美國代表是羅伯遜。軍調部上面還有一個三人軍事小組，由中共代表周恩來、國民黨代表陳群和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組成。



在此後一年多時間裡，由於國民黨肆意破壞停戰協定，在全國各地的中共控制區不斷挑起事端，軍調事務越來越繁雜。為應付這一局面，各方抽調了大量人員到軍調部工作，人數最多的時候達到了九千餘人。中共方面人數最少，但也有六百餘人。

他們大多是從延安和其他解放區抽調過來的。

一九六二年，北京電影製片廠拍攝了一部電影《停戰以後》，影片裡塑造了一批在北平軍調部工作的中共人物形象，其中由秦怡扮演的那位漂亮的女翻譯謝梅初，給人印象最為深刻。這位女翻譯出生在一個高級知識份子家庭，初次參加革命，對解放區的生活充滿了新奇感和嚮往……

這個人物的生活原型就是王光美。值得一提的是，劉少奇曾經誇獎這部電影拍得相當好。

在軍調部，王光美是第一次接觸從延安和其他解放區來的人。以前，對那邊的生活和那邊的人，她只是聽人說，或在媒體上瞭解一些。如今面對面接觸和親身體驗，讓她充滿了新鮮感。性格活潑的她經常找他們聊天，向他們打聽延安和解放區的事。一位從延安來的工作人員告訴她，延安有一條河叫延河，冬天會結上一層厚厚的冰，可以在上面滑冰。王光美馬上興奮地說：「那好，我以後到延安一定帶溜冰鞋去。」

當年同在翻譯處工作的沈容女士在回憶錄《紅色記憶》裡將王光美與另外一個工作人員陳舜貽作了有趣的比較：

兩位雇員的作風卻截然相反。陳舜貽埋頭工作，到點上班，到點下班，不同任何人談話。王光美大不相同，注意打扮，比較活躍，每到吃飯的時候，在飯廳旁邊的休息室和人聊天。執行部南來北往的

人很多，她喜歡和別人聊，問長問短。總而言之她是一位非常引人注目的人物。當初，我們都不知道她是什麼關係請來的。有一次開黨小組會，我和柯柏年、章文晉一個小組，在會上他們談到這兩位女士，怎麼一個悶聲不響，一個說個沒完，有些不放心。他們說我是女同志，容易接近她們，要我多和她們接近，瞭解她們的情況。

於是，我有空就到她們的辦公室去看看。王光美見我去，仍是話很多，問我：「你看看這句話這樣譯對不對呀？」等等。後來她被調去和美方聯繫我方乘飛機的事，李普到華東一帶採訪，每次都通過她聯繫美軍飛機……解放後我才知道，她之所以能去執行部是因為她的一個哥哥是黨員，叫王世英（即王光傑，後改名王士光——編者注），妻子叫王新。他們夫婦倆和我們常來常往。

我去陳舜貽的辦公室時，她只是請我坐，再沒別的話了。我要想法打開她的話匣子，就問她來這裡工作習慣不習慣。她只是點點頭。我只好單刀直入，我說：「你來這裡也有些日子，怎麼沒聽你說過話？」她望著我，臉紅了，她說：「人們都說共產黨人很凶，很可怕，所以我不敢說話。」原來如此，我禁不住笑了。我說：「你看我凶不凶？」她說：「你不凶。」我說：「我就是共產黨人呀。」

和陳舜貽的談話，使我感到日本人和漢奸在淪陷區的反共宣傳實在厲害。

（沈容：《紅色記憶》，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二〇〇五年）

和陳舜貽女士一樣，王光美也在日本統治下生活了八年，可她不但害怕共產黨人，相反對共產黨還充滿了好感和好奇。除了經歷和經常接觸的人可能不一樣，兩個人的差異主要是因為性格。王光美性格活躍，為人熱情，自然沒有陳舜貽女士那麼拘束，說話自然也就多一些了。

當時在軍調部當少校參謀的楊迪對王光美也有深刻印象。有一天，楊迪騎一輛摩托車回到翠明莊，王光美看到，馬上走過來，熱情地說：「楊參謀，騎摩托車是不是很好玩？我想坐你的車兜風，你帶我玩一趟好不好？」楊迪以為她開玩笑，便順口說了一句：「只要你敢上來坐，我就敢開著跑。你嚇得掉下來，我可不負責呀！」她說：「我不怕，會抓住的，你開呀！」楊迪真的騎上摩托車帶她繞故宮轉了一大圈，他還以為做了一件好事，不巧，回到翠明莊的時候被李克農發現了。看到李克農一臉嚴肅，王光美趕快走開了，李克農把楊迪叫到辦公室狠狠地訓了一通：「一個軍人帶著一個小姐兜風，這是美國大兵幹的事，老百姓非常痛恨。萬一今天你們被記者發現登了照片，影響有多壞？王光美是名門小姐，她的家是我們黨統一戰線的物件。你這次魯莽的行動，如果發生了嚴重的後果，不僅毀了你自己，同時也毀了她的名譽。我們怎麼對得起她和她的家庭？」

訓完之後，李克農警告他：「如果明天國民黨的報紙，不論是
小報還是大報登出了你今天騎摩托車帶女郎的新聞、照片，我就直接送你回延安，你要受到嚴厲的處分。」楊迪一夜沒睡好。事實上，根本沒有記者發現這件事，報紙更沒有刊登他們的照片和消息。楊迪虛驚一場，但他一直沒有把挨批的事告訴王光美。

在軍調部，王光美為人隨和，待人也熱情，很快融入到中共代表團的集體當中。對初次到北平的工作人員或家屬，她總要盡地主之誼，帶他們遊覽北平的名勝古蹟。有一天，羅瑞卿參謀長的夫人郝治平帶女兒從張家口到北平看望丈夫。羅瑞卿因為工作太忙，無暇陪伴，便把她介紹給王光美：「我們代表團有位年輕女翻譯，叫王光美，是北平的大學生，讓她抽空陪你們在北平走走吧。」王光美熱情地陪著她們母女倆玩了幾天，對她們照顧有加。郝治平和王光美從此成為朋友，並保持了數十年

的友誼。還有一次，中共代表團一對新人在翠明莊舉行婚禮。王光美主動為他們佈置婚禮會場，製作禮花，並很快和剛到北平的新娘康岱莎成了要好的朋友。

在軍調部工作期間，王光美近距離地接觸了許多中共高級領導，特別是結識了中共領袖人物周恩來。





為中共工作

剛到軍調部，王光美主要負責筆譯「備忘錄」，這些檔是執行部派出去的執行小組從有爭議的地點發來的電報，內容都是國民黨軍隊首先開槍，占了解放區什麼地方，打死了多少人，奪走了什麼武器等等。王光美和同事一起把這些材料翻譯成英文，提供給美方代表參考。翻譯完正文後，他們最後總要加一句：「一切嚴重後果由國民黨方面負責。」

文字翻譯對王光美來說不算難事，但因為初次翻譯軍事方面的材料，對一些軍事術語還比較陌生，所以每次碰到難題，她會很謙虛地向其他有經驗的工作人員請教。

兩周後，王光美開始給軍調部執行處和整軍處等部門的領導當口語翻譯，這項工作比筆譯「備忘錄」更難也更累。前一段時期，軍調部幾乎天天有會，天天有口譯任務，三方會議桌上雖然看不到刀光劍影，但言語之中時常充滿了火藥味。有一次，國民黨代表胡攬纜纏，對國民黨軍隊製造的事端死不認帳，出席談判的執行處長宋時輪將軍忍無可忍，大發雷霆，最後拍著桌子罵了起來，而且言語很粗俗，很難翻譯成對應的英語。王光美急中生智，用英語對美方代表說：「宋將軍生氣了！」雖然沒有翻譯具體內容，但也達到了同樣效果。

在與國民黨代表面對面的鬥爭中，王光美經受了考驗，也得到了鍛煉。很快，她的工作能力和表現受到了葉劍英的讚賞，不久，她便開始給葉劍英當翻譯。

一九四六年初以來，國民黨政府高唱「和平」，曾經迷惑了一些人，但實際上，他們明裡暗裡都在破壞停戰協議，積極發動內戰，同時對中共代表團的干擾也越來越放肆：安排特務跟蹤盯梢中共方面的工作人員；策劃、組織逃亡地主到軍調部門前「示威」，反對共產黨，搗毀中共代表團的辦公室；非法封閉新華社

北平分社和《解放》報社；槍擊中共代表團人員的車輛……

為了配合葉劍英和共產黨的統戰工作，王光美經常向葉劍英彙報大學校園的情況和北平學生、教授們關心的問題，並為他聯絡、介紹了許多知名教授。後來，這些知識份子都勇敢地站出來，向不知真相的民眾揭露國民黨政府「假和平，真內戰」的陰謀，在北平掀起了「要和平，反內戰」的群眾運動。

由於美方和國民黨政府對軍事調處越來越消極，從一九四六年六月開始，軍調部的三方會議越來越少，翻譯人員也漸漸清閒起來。王光美便從翻譯處調到交通處幫忙，協助安排交通工具轉運中共幹部。那段時間，中共許多領導幹部就是乘坐由她以軍調部名義聯繫的美國飛機而得到了迅捷調動。

如果說剛開始她把翻譯當成一項普通工作，那麼越到後來，她越感覺自己是在用心為共產黨做事，而且自己的心與共產黨貼得越來越近了。她晚年回憶說：「我在軍調部的那些日子裡，幾乎天天有會議，有翻譯任務。在工作中，我接觸到了葉劍英、李克農、羅瑞卿同志等領導幹部。他們那種一心為革命、為人民的崇高精神和勤奮扎實的工作作風，令我非常欽佩，給了我深深的教育。」

有一天，王光美和軍調部的領導迎接周恩來和馬歇爾將軍。在機場遇到了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他發現王光美在為共產黨工作，很是吃驚，在回城的路上，他把王光美拉上他的車，問她：「你還去美國留學嗎？」李宗仁和王光美的二哥王光琦是朋友，到北平後，來王家串過幾次門，認識了王光美。

顯然，李宗仁問王光美出國留學的事，既是提醒，也是警告：既然你死心塌地為共產黨做事，就別想再到美國去了。王光美沒有直接回答他，更沒有和他套近乎，只是敷衍地說了一句：「以後再說吧。」



飛向延安

一九四六年八月，由於國民黨政府全面發動內戰，美方宣佈調停失敗，中共代表團開始陸續撤離軍調部。

高級軍事幹部首先調整：參謀長羅瑞卿赴任晉察冀軍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執行處處長宋時輪調任山東野戰軍參謀長，整軍處處長陳士榘擔任了山東軍區參謀長……隨後分批撤離普通工作人員。

十月的一天，葉劍英派人徵詢王光美對自己去向的打算。王光美毫不猶豫地說：「我去延安！」知道她的決定後，葉劍英特意找她談話：「到延安去好。年輕人就是要有理想，把學習的知識用來為人民服務。不過，你到解放區去，要有吃苦的思想準備，而且知識青年一定要正確看待工農出身的同志。」王光美連連點頭。

剛去軍調部的時候，王光美並沒有完全確定今後的去向，但在軍調部幾個月的經歷幫助她做出了最終選擇。從延安和其他解放區來的那些共產黨人為她打開了一扇明亮的窗戶。透過這扇窗戶，她看到一個嶄新的天地。這是完全不同於國統區的世界，充滿了希望和新奇甚至浪漫的色彩。作為一個熱血青年，她對解放區特別是延安，確實充滿了由衷的嚮往。

當然除了這些主觀原因，客觀上的因素也是促成她選擇去延安的重要原因：公開為中共代表團工作，使自己的身份暴露無遺，繼續留在國民黨統治的北平，必然給自己帶來許多麻煩，更不用說再和北平地下黨組織聯繫了。

王光美把自己的決定告訴了母親。對愛女即將遠離自己，走上一條充滿未知因素的人生道路，董潔如不但沒有反對，反而鼓勵她說：「去吧！解放區挺好，共產黨挺好！」臨走前幾天，王

光美在家裡陪媽媽聊天，還幫她做了好多家務事。父母一直把她當成掌上明珠，百般呵護，真要遠遠地離開他們，王光美心裡真有點捨不得。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日，王光美在中共代表團領導的安排下，搭乘一架美國小型飛機，飛往延安。同機的還有周恩來的秘書，後來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宋平，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組長包瑞德。因為互不認識，他們一路無話。

那天天氣很好，天空藍藍的，還飄著朵朵白雲。因為是第一次坐飛機，而且是去自己嚮往的延安，她顯得有點興奮。在飛機上，她不停地站起來，透過機窗俯看下面的景色。包瑞德終於忍不住開口說話了：「別看了，都是大山。這樣不安全！」顯然他坐飛機是家常便飯，去延安也不是第一次。

電影《停戰以後》裡有這樣一個鏡頭：謝梅初第一次到解放區，興奮不已，情不自禁地說：「啊，終於到家了！」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一批批熱血青年奔赴延安，參加革命。在他們心目中，延安是革命的聖地。當時的王光美和謝梅初，和許多同時代的熱血青年是一樣的。

先期回延安擔任軍委情報部部長的李克農，帶著夫人到機場迎接王光美。在人地兩生的異鄉見到曾在北平軍調部一起工作的老領導、老熟人，王光美仿佛真的回到了家。她趕忙把從北平帶去的一包好茶葉送給了李克農的夫人。





延安新生活

延安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城，地處陝西省北部，黃河中游黃土高原腹地，歷史上一直是漢民族與北方少數民族的交融地，很早就成為陝北地區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中心。一九三七年中共中央進駐延安後，這裡成了紅色革命的指揮中心和總後方，也是許多熱血青年心馳神往的革命聖地。

到延安後，王光美被分配在中央軍委外事組工作，住在延安城西北的王家坪。當時王家坪是中央軍委和八路軍總司令部所在地，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軍委秘書長楊尚昆等中央領導住在此地。

王光美安頓下來沒幾天就得到通知，中央部分機關要撤離延安。原來，國民黨胡宗南的軍隊準備大舉進攻延安，形勢驟然緊張。王光美便隨中央軍委外事組撤到了離延安七十多公里的瓦窯堡。

這一回可是到了地地道道的農村，那裡的生活條件比延安更艱苦。但第一次到農村的王光美不但不覺得苦，反而對那裡的一草一木充滿了新鮮感。在瓦窯堡，她還向當地農民學會了紡紗織布。

這期間，中央將胡宗南準備進攻延安的情報公之於世，當時還在唱和平調子的蔣介石迫於輿論的壓力，只好暫時息兵。十一月下旬，原來疏散出去的機關人員又返回延安。這一次，王光美在延安待了五個月，開始真正感受這片革命聖地的風情。

來延安之前，她在軍調部聽同事說延河冬天結冰可以溜冰，特意帶了一雙溜冰鞋。有一天，她特意到延河觀察了一會，河裡確實結了厚厚的一層冰，但等了半天，沒有看到一個人出來滑冰，一打聽才知道，延安人根本沒有這個愛好。她慶幸自己沒

有貿然行動，否則真會鬧出洋相。回到宿舍，她悄悄把溜冰鞋藏了起來。

在王家坪，王光美被安排吃的是中灶。當時延安實行供給制，伙食標準分為大灶、中灶、小灶和特灶。基層幹部和士兵吃大灶，中級幹部和高級知識份子吃中灶，中央委員吃小灶，中央領導吃特灶。王光美是碩士，當然可以享受高級知識份子待遇。

按當時中央軍委機關的伙食標準，大灶是每人每月肉一斤半、油一斤、鹽一斤、菜三十斤，每日小米一斤四兩；中灶是每人每月肉三斤、油一斤半、菜三十斤，每日小米一斤四兩；小灶則沒有具體規定。顯然，中灶伙食比大灶好一點，不但有菜，有時還有一點肉片，不過油水都少得可憐，所以王光美也會經常感到餓。

去延安的時候，她從家裡還帶去了一個紅緞子被面。下鄉的時候，老鄉看到了，覺得稀罕，一到她的房間就忍不住要摸一摸她的被子。她意識到這個被面在延安太顯眼了，乾脆把它拿到瓦窯堡集市上賣了，換成粗布被面和幾斤紅棗、豬肉，回來煮了一鍋典型的延安特色菜「紅棗燉肉」，和同事們解了一回口饞。

延安雖然遠不如北平那般繁華，物質生活也比較艱苦，但文娛活動還比較豐富，每週有舞會和文藝表演，有時到美軍觀察組駐地還能看上一場電影。王光美喜歡的陝北民歌更是隨時隨地都能聽到。

延安的交際舞興起於三〇年代，最初是由一些外國記者傳授，從上層領導開始，作為一種休閒方式，很快在這個偏僻的古城

推廣開來。最盛行的時候，一到週末和節假日，便有不少人在露天操坪跳舞。每當皓月當空，星光如洗的時辰，熱情的魯藝音樂系小夥子們必會輪流吹奏起美麗的樂曲，露天舞場上一對對青年男女翩翩起舞，沉浸在融融的月色裡。歡聲笑語伴著動聽的旋律，迴盪在金秋歲月黃土高原上的山水之間。

王光美到達延安的時候，這一盛景早已不再，但每週一次的舞會仍然保留了下來。一九四六年在延安採訪過的美國記者安娜·路易士·斯特朗曾生動地描述延安舞會：「中國樂器和西洋樂器合璧，奏出像老黑喬這樣的古老舞曲。這裡跳華爾滋舞、兩步舞和一步舞，還有一種配合秧歌音樂的四步舞，像是狐步舞，只是擺動要大一些。人們無拘無束，想跺腳就跺腳，想溜圈就溜圈。一些專業舞蹈演員，還把武打搬了出來。勤務員小鬼們——在世界其他地方就會把他們稱作苦力了——也同黨和政府領導人一起歡快地跳舞……」

顯然，當時的延安，官兵關係隨和，同志之間相處融洽，自由空氣遠比日本人或國民黨統治下的北平濃郁。王光美晚年回憶說：「我從大城市來到延安和瓦窯堡，沒覺得特別不習慣，比我來之前想像的要好，覺得充實。可能因為北平長期在日本人統治下，人們思想比較壓抑，生活也不好。到了這裡，平時生活不算好，但也時不時改善一下。我在延安的幼稚園裡看到，小孩子一個個胖呼呼的，小臉紅通通的……」

生性活潑、喜歡集體生活的王光美很快就喜歡上了延安，並且如魚得水地適應了這裡的生活。雖然穿著樸素，但她的漂亮外表和優雅風度還是讓她成了延安的一道清新亮麗的風景，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據她本人回憶，當時，有一個叫李敦白的美國人就經常來到她的住處串門，找她聊天，還給她寫過詩歌……

李敦白可說是當代中國歷史的一位神秘傳奇人物。他與王光美同歲，美籍猶太人，曾加入美國共產黨。一九四五年作為美軍軍法部門的工作人員到中國工作，一九四六年十月到達延安，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被分配在《解放》報社工作。在延安，他與王光美確實有過短暫的來往。在他印象中，王光美是一位「身材苗條、活力四射、很得體的年輕女子」（《李敦白回憶錄》）。

「文革」初期，李敦白也參與了批鬥王光美，並在清華大學的批鬥會上發了言，但不久也被冤枉關進了監獄。當審查人員追問他與王光美的關係時，他回答說：「我在北平軍調部拜訪葉劍英的時候，她也在場。後來在延安重逢，當時她和劉少奇還沒有結婚呢。有一天，她請我吃回鍋肉，過了幾天，我又請她吃回鍋肉，當時在延安，吃一碗回鍋肉算是豐盛的菜肴了。就這麼回事。」

（《炎黃春秋》二〇〇五年第六期《「洋特務」李敦白》）

一九八〇年，李敦白和妻子移居美國。王光美去世後，他接受媒體採訪時，說王光美「是一個很高尚的人物」。

在軍委外事組，王光美的工作主要是做一些文字翻譯，摘譯、整理一些有價值的外文材料，供中央領導參閱，有時也給朱德、周恩來當口語翻譯，應付外國記者的採訪。經過在軍調部的大風大浪，這些工作對她來說已經是輕車熟路。

